

近代史研究

JINDAISHI YANJIU

2

1990

1979年10月创刊

1990年

近代史研究

2

(双月刊)

总第56期 3月出版

天壤公言录——《中日学者对谈录》序……………刘大年(1)

* * *

金观涛的理论追求及其迷误……………蒋大椿(10)

* * *

唐廷枢与轮船招商局……………陈 绶(31)

倭仁与曾国藩……………宫 明(65)

再论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

近代史的主要线索……………牟安世(77)

刘师培的今古文观……………陈 奇(93)

章太炎与白话文……………汤志钧(112)

中华革命党与护法运动……………莫世祥(120)

* * *

近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金安平(134)

五四运动中的农界……………胡元利(156)

宋子文广东理财述评……………吴景平(164)

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官制的特点……………吴建国(185)

对1927年南京事件几种评论的剖析……………郭曦晓(200)

论西北军的瓦解……………顾关林(216)

抗战期间国民党组织建设与组织发展的几个问题

.....王贤知 (230)

* * *

书评

和

评介

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

.....陈铁健 刘敬坤 王学庄 (251)

《中国海关简史》评介.....王意家 (266)

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在台港.....夏良才 (271)

台湾版近代中外关系史料概述...李学通 李晶 (300)

动

态

中国现代史学会举行纪念

建国40周年学术讨论会.....曾景忠 (315)

更正..... (299)

天壤公言录

——《中日学者对谈录》序

刘大年

一年以前，这部书已经出版日文本。主编者是井上清、卫藤沈吉，书名叫《日中战争与日中关系——卢沟桥事件50周年日中学术讨论会记录》。1988年9月东京原书房发行。中文本《中日学者对谈录——卢沟桥事变50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文集》的内容、编排与日文本全部一样，只是把前者的序言、跋语移作附录了。书名叫《对谈录》，是为了突出它是中日学者共同讨论的记载。学术问题，有时要夹带点咬文嚼字。“对谈”有异于时下流行的“对话”，更符合于双方共同讨论的实际情况。

关于诞生这部书的1987年学术讨论会，我曾写有一篇短文予以评介，题目叫《从京都到东京——记卢沟桥事变50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载在《中共党史研究》创刊号上。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井上清先生、亚细亚大学校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卫藤沈吉先生，他们主持的京都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东京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以及日本学术界的其他朋友，为主办这次讨论会，做了卓越的组织准备工作。参加讨论会的中日学者，一致认为那次讨论会开得很圆满，很成功。井上清先生在《日中战争与日中关系》跋语中，引述了我在讨论会结束后在庆应大学楼前向与会日

本学者告别时说的话：“京都创始，东京集成；先后接力，成此盛举。”现在我要说，那个话不止适用于讨论会本身，也适用于这部书的出版。日文本变为《对谈录》，准备工作几起几落。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负责同志热情支持，使之得以实现。倡议筹办和参加学术讨论会的日本朋友见到这个文本，我想他们也会感到欣快。

二

这部文集涉及的范围很广。有些具体问题提出来了，还应该深入研究，使现有成果得到发展。从总体看，这部书无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今年2月，我在一次会议的发言中引述了《日中战争与日中关系》的基本论点。我说，它是一部有份量的书，强调指出了日本对中国进行的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个性质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发言在《人民日报》上刊出^①以后，引起了国内外的反响，议论见诸众多新闻媒介。虽然那些议论的中心并非为了讲这本书，而我们却可以看出它与评价这部书的直接联系。

国内的反响，是一致支持反驳日本当局的无理辩解，《中国青年报》所载《访刘大年》^②和《人民中国》8月号的《对谈》各有披露，不必细说。

国外的反响立论角度不同，但没有哪个评述是与书上的基本论点相左的。日本共同社播发记者伊藤正自北京发出的报导，标题是《〈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刘的讲话，天皇的责任问题在扩大》。其中说，“中国对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的反应是极力克制的，但对于日本国内重新兴起崇拜天皇的热潮逐步提高了警惕。

① 1989年2月21日《人民日报》。

② 1989年2月28日《中国青年报》。

可以说，刘大年的批评表明中国国内由于首相的发言而一举暴露出不信任 and 不满。”^① 时事社发出评论：“竹下首相在国会答辩说是否为侵略战争，应由后世的历史学家作出评价，对此，中国和韩国等国家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原国土厅长官奥野在去年5月因为讲‘日中战争是偶然发生的’而辞职。不难想像，这次发生问题后，首相对奥野辞职会记忆犹新。”^② 《读卖新闻》2月21日夕刊登载黑字大标题的消息：“中国人大常委会批判首相有关战争责任问题的发言”。《朝日新闻》在报导中，根据香港发回的消息，说我在发言时手里拿着《日中战争与日中关系》这本书。法国《世界报》发表文章：《北京批评竹下登的讲话》，文中说，批评是一个中国历史学家发出的，“竹下登被指责为违背了好些同意中国的说法的日本历史学家作出的结论，这种结论是：战争是以日本入侵中国为开端的。这些说法是很难反驳的。”^③ 苏联塔斯社政治观察家阿斯科尔德·比留科夫在长篇评论里说：“轴心国发动了反对人类的侵略战争，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联合国对这个事实所作的评价已载入遵循联合国大会所批准的国际法原则的纽伦堡和东京国际法庭材料。”刘大年的发言指出，“日本国内大部分历史学者以及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早就对那场战争（日本侵略战争）作出了一致的评价”。“日本当权人物不承认对这一历史事实的固定评价的企图使人们怀疑他们能否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他们给自己忠于和平政策的保证的诚实性投下了让人怀疑的阴影。”^④ 美国纽约《中报》发表社论，批评日本当局自欺而不足以欺人。社论特地叙述：“刘大年以日本新近出版的《日中战争与日中关系——卢沟桥事件50周年日中学术

① 1989年2月21日共同社电讯。

② 2月21日时事社《大丧礼之前，为平息事态而努力》。

③ 费朗西斯·德隆：《北京批评竹下登的讲话》，1989年2月22日《世界报》。

④ 1989年2月21日，塔斯社俄文电讯。

讨论会记录》为例，说明包括编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井上清与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兼亚细亚大学校长卫藤沈吉在内之多位日本学者，无不以日本侵略为定论。”社论并引述了远山茂树教授在讨论会上所作的总结发言。^①

国外舆论如此强烈而又像一个声音一样讲出来的话，与我们评价这本书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第一，那些言论不是学术评论，更非某种书评，但是它们讲的基本论点，也就是《中日学者对谈录》的基本论点，不带支离含糊，更没有异议相左的地方。第二，那些言论中，或者指出本书的观点，或者直接引用《日中战争与日中关系》，这是明白无误地承认本书的可信性，或者说承认它的权威性。第三，对于抗日战争这段重大历史看法如此一致，说明本书的基本论点，不是少数历史学者一家或几家之言，不是少数人的私言，乃是世界各国众人之言，是天下之公言。由此可见，国际众多舆论媒介像一个声音讲出来的话，尽管不是为了谈论这本书，却又是一致直接充分肯定了这本书。这个事实是太明显不过了。天下的公言怎样才能使更多的人了解？一要有人宣讲，二要经过科学研究来宣讲。《对谈录》从科学研究来宣讲天下的公言，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

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常常被一些人认为缺少科学性，以至根本算不上一门科学。他们的理由是，不用说实用主义、庸俗无聊的东西了，严肃的历史著作也总要受到国别、民族限制。摆脱不了民族利己观念的纠缠。同一问题，各执一词，黑白真伪，难成定说。如果说，这种看法指出了不少历史撰述确实存在那种严重缺陷，但是因此就否定整个社会科学和历史学，显然是完全不正确的，只表现了某种糊涂观点或偏见。社会历史与自然现象不同，是由具有不同思想意志的人活动的产物，然而这并不能说明

^① 1989年2月27日《中报》社论：《欲盖弥彰的裕仁战争罪行——再斥日本洗刷战争罪责之蠢行》

对它的研究就必然要存在非科学性。社会生活中各种现象都包含着矛盾，都需要具体分析。民族关系、民族感情就是一个包含着矛盾，特别需要分析的问题。关键在于研究者的指导思想 and 独立分析精神。《中日学者对谈录》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样板。日本学者的论文占全书2/3，内容从政治、军事、经济到意识形态、国际关系，作者尊重事实，独立分析，采取客观冷静态度对待民族矛盾、民族感情，使这些论文“不期然地构成了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史论体系”^①。中国学者的论文，同样贯彻了客观分析。没有人可以指出其中有什么“民族狭隘性”。就因为这样，他们不约而同得出了基本的共同的结论。这对于那种以为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不科学的观点，实在是一个有力的反驳。在涉及民族关系、民族矛盾的重大历史问题上坚持科学态度，这一点，意义格外深长。

历史著作各种各样。《对谈录》不是一部讲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系统著作，但它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一部名著，是一部由中日学者集体创作的名著。现在它已经受到重视，其影响今后也将要传播下去。

三

中国学术界研究抗日战争史，近年来出版了大量论著。但全面叙述那段重要历史的系统著作仍感寥寥。前几年我在卢沟桥纪念馆举行的抗日战争学术讨论会上提过一个建议，主张集中力量写出一部比现有水平再高一些的抗日战争史的著作，同时编一部基本的资料书。著作要充分汲取中国、日本和世界各地研究这段历史的成果，在科学上具有权威性代表性；资料书则要依据档案等原始材料，反映历史的主要过程。一部新水平的书，一部较为

^① 1989年，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会报》，井上清：《卢沟桥事件50周年日中学术讨论会圆满成功》。

扼要完整的资料，可以推进科学研究工作，更可以满足现实生活中的需要。

写出一本全面的抗日战争史，是社会上不少人关心的事。今年2、3月间，由于前面提到的那次讲话，我接到国内外大批热情洋溢表示赞同的来信，不少信上并提出各种建议和要求。写书便是一些来信的建议之一。一位居住巴黎、谦称“愚侨”的陈庆怡（字强先）先生的来信，详细讲述了他对抗日战争过去快半个世纪的今天人们应该做些什么的看法。关于写书，他说“日本侵华战争性质的问题，原是不争之论。只不过日本自知罪恶深重，妄图掩耳盗铃，不肯承认而已。最好由中国邀集日本及战时遭受其侵略之害各国认识公道之历史学家，共撰一部《日本对外侵略史》，并请日本政府高明详列有关侵略之各种学说，同样邀集各国之国际法家，逐说论列，作为附录。战争半个世纪之后，足为公论，不宜再往后世推托。”^①陈先生的主张是值得重视的。题目、办法可以斟酌，而这项工作需要动手来做。尽管往后人们会多次写这样的书，而我们现在来写有现在的适当条件和必要性。

“不宜再往后世推托”，这个话讲出了许多人的共同看法。

抗日战争的内容异常丰富，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占有特殊重要性。我们的研究要有具体项目，而又必须从更加广阔的范围来看待这个工作，不能把眼光局限在某个具体项目上。抗日战争一周年的时候，毛泽东说：“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怎么空前，怎么伟大，那时只是一个概说，一种展望。50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把它说得全面、实在了。第一，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根本转折。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决战，加速了中国走进社会主义。在那以前，每一次革命斗争、爱国运动各有功绩，却没有任何一次足以比得上抗日战争推进历史车轮的显赫功绩。第二，

^① 见附信摘要。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它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空前觉醒下取得的。这些觉醒了的爱国力量，有今天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先辈，有海外一切关怀祖国命运的炎黄子孙。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就是研究他们共同斗争的历史，研究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空前觉醒的、爱国主义的历史。第三，抗日战争不止在中国历史上有极大重要性，在日本历史上也有极大重要性。中日两国都在这次战争中和战后发生了极大变化。中日两个国家两国人民都可以而且完全应该从中日战争中学到非常重要的东西。睦邻友好、共同发展前进的道路，是中日两国关系中唯一应该遵循的道路。这是那场严酷战争给予人们的根本教训。第四，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中国抗日，才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亚洲和东方的胜利。论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忽视以至撇开中国抗日战争，就好像闭着一只眼睛看世界，不能见其全局。这不止涉及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也涉及如何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特别是东方发生的一系列历史巨变。抗日战争的所有这些方面，在不同程度上与当前的社会生活保持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全面深入研究它们，更多地了解这段未久的过去，我们将能更好地辨认历史前进方向，正确地分析、看待现在和未来。因此，今天不是要考虑这种研究是否差不多了，而是要讨论如何真正有计划地展开这方面的工作。

确认抗日战争的性质，关系到研究讨论的每一个方面。《中日学者对谈录》从科学上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出版中文本，对于我们要进行的具体项目和有关的广泛研究，都是有帮助的。一些对谈文章警醒生动，可以估计，众多的读者会同样感到饶有兴趣。

(1989年)

附：陈庆怡先生来信摘要

陈氏来信上注明：John C. Chen, 20r de la Terrasse, 75017 Paris, France。日期是1989年3月13日。信的摘要如下：

浅见以为如果我国也像国外一样，遇事均有许多民间组织不断地从旁

努力推动和争取,不事非官府躬亲倡导为之不可,则虽然我国政府的官吏怕因交涉而坏了表面的关系,不肯出头争取实利,仍旧早晚会有得直的一天。例如巴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只不过德军区区一个集中营的尉级后勤官而已,当年遵照指令,将营内数千法籍犹太人自法境递解至他处而已。法国在法籍犹太人的推动下,终于年前将他引渡回法受审。其他类此引渡受审的事例多不胜数,甚至有引渡回苏俄受审的。无论西德、东德,对二次大战中犹太人的生命财产损失,均始终委曲求全,尽力满足犹太人的要求,予以赔偿。美籍日人珍珠港事变后曾受到集中看守,战后美籍日人及日本人不断努力及争取推动,终于去(或前)年获得美国国会立法赔偿(每人US\$2万元?)及国会通过的正式道歉(每人一份)。这只是几年的半失自由,而无生命财产的损失,更无残忍屈辱的杀戮。二次大战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日本人及美籍日人在二次大战后努力争取要求赔偿,则更早已多次如愿以偿。因为战争是国家行为,一国在战争中犯下的错误或罪行,都责无旁贷应该由这个国家来承担。这些与二次大战中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所犯的罪行一样,都是一个国家犯下的错误、罪行,不能往当时在位者的身上一推即轻松了事的。

然二次大战日本在我国侵略时间之长,动用兵力之大,侵占领土面积之广,杀死杀伤中国人民之众、之残忍,掠夺损坏的物资财产之多,在在均非犹太人在欧洲之遭遇及美籍日人在美国之情形可比。除作战之军费,日本已无耻利用中国之内部矛盾,使中国不得已而作罢外(连正式之道歉也无一声,只由田中在酒会中致辞时,顺便挂了一句而已),对中国民间的损失赔偿,日本一直厚颜不提,而中国则一直无人主张。对民间的赔偿任何政府或个人均无权答允豁免,答允了也无效。……

大战甫行结束,彼此都民生凋蔽的时候,我国人民立即要求大量的赔偿,是有点不切情理的。但目前日本已成经济大国,对外援助远及二次大战毫未受其侵略蹂躏之他国,总额则已超过美国对外之经援,积存外汇盈余世界第一,国民平均所得高出美国,如仍吝不对我国民间的损失早作合理之赔偿,则是罔顾礼义,令人齿冷之行径。尝听人说,日本以其见面时之礼节为荣(二人见面,互相鞠躬为礼,……直至二人均已低头及地),何以在赔偿一事上,中国早已一躬到地,表示作战之军费豁免,而日本则一再斤斤于回礼之性质为何?责任谁属,其厚颜罔顾礼义如此!

有一个为日本保留面子的办法,即不提当年战争中中国直接死难的二

三千万人（据胡乔木说是2700万），这当然没有包括千千万万逃至大后方后绝望自尽的、患病无力治疗而死的、无衣无食冻饿而死的、未及到大后方辗转死于沟壑的，权作总共死亡八千万人计；再加掠去的物资及损失的财产（不计因空袭攻讨而停市、停工、停垦的损失），不按美国赔偿的高标准（一命、一残有判赔上千万美元者），不按国际航空失事赔偿的高标准（每人US\$10万元），不按印度法院裁定美国联合氰铵公司毒气意外之泄漏毒死附近居民的低标准（约死3000人，共赔4.7亿美元），甚至亦不按美国赔偿集中了的美籍日人或原子弹炸了的广岛、长崎日人的赔偿标准，而只作为每人US\$15000计，共美币12000亿元。加上自1940年（取抗战八年之中期）以来50年累计利息，如以年息4%计，当有 $12000 \text{ 亿} \times 1.04^{50} = 85280 \text{ 亿}$ ，以3%计，亦有 $12000 \text{ 亿} \times 1.03^{50} = 52607 \text{ 亿}$ 。每人一万五千美元之数，国内虽数十年处于低收入之标准下，亦不应以为多，而拖一天即付一天之利息则是财务上之道德标准。如美国全年预扣之所得税年度，结算时，退回的部分均按国库券之利率标准付利一并退还的。日本数十年来国库券利率多少，我不得而知，但相信一定高于4%。

这笔钱收到后，应象日本甲午战争后索取中国白银一亿两（=1.1913亿英两）一样，全部用于教育。（大年按：此处事实有误。日本从中国勒索的赔款共两亿三千万两，其中二千万日元归入皇室私产，一千万日元用于备荒，一千万日元用于教育基金，一千二百万日元补助1893年特别军费支出，其余近三亿日元全部用于扩充军备基础，如建立八幡制铁所等。）但不全部直接耗掉，而是由国家设立专管机构，投资国营、公营、民营各行各业，而每年将税后之红利股息用于全国图书馆及科研单位、大中小学幼儿园之扩充改建，职工工资之调高及工作环境条件之改善上，成为中国在政府教育预算之外，永世不竭之教育基金（但除必需的实验工厂、商场、农场等之外，不要有学校各别的校有工厂、商场等，而成为学校的小钱柜，这样各校既不易公平，又有政企不分之弊，亦非国家之福）。五至八万亿美元，约合20万至32万亿人民币，即使按八年期以上之长期存款利率（17.4%）降至目前的一半，再打折为只有5%计，每年即可有利息一万至十六万亿元人民币，甚至再减半，也还有五千至八万亿人民币，足敷我国教育赶上世界最佳水平之需。

（删节号以外，有几处文字不衔接，是来信上原有的脱漏。）

（责任编辑：曾景忠）

（作者刘大年，191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金观涛的理论追求

及其迷误

蒋 大 椿

十年来，金观涛以一位自然科学工作者涉足社会历史科学，写了好几本史学和哲学书，文章也发过一些。他有一些论述，自相矛盾。总的趋势是，在理论追求的迷误中越陷越深，一直发展到提出所谓社会主义尝试失败论，在政治上失足。金观涛的十年理论追求，给我们留下不少值得进一步思索的东西。

一、从非难“终极原因”着手，否定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

十一届三中全会牢固地确立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我国社会进入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时代任务的变化，促使史学也必须发生相应的变革，包括观念的变化和研究手段的丰富，以更充分地满足社会主义新时代对史学提出的更高要求。我国改革的正确方向和现实出路，只能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史学，也只能在更加完整准确地理解的唯物史观指导下，才能在真正满足时代更高需要的同时，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方向发展自己。而在这样重大原则问题上，新时期十年的史学领域，是存在严重分歧的。史学领域分歧的焦点之一，便是对待唯物史观的态度。

金观涛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和史学发展的背景下，由自然科学进入史学领域的。本来，沿着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融合的方向，金观涛能够运用自己的长处，在历史科学中有所作为。问题在于，金观涛在进入历史研究领域时，不仅历史知识准备不足；更重要的是，他在并未真正懂得唯物史观实质的情况下，便贸然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妄加指责，一开始便选择了一条错误的理论方向。

金观涛的第一篇史学论文《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①，本来是要解决一个实际历史课题的。他却从方法论的高度提出，在历史研究中，寻找终极原因的方法是“无能为力”的。说：“认识中国，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我们在方法论上有所建树，它需要我们从分别寻找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终极原因的传统方法中摆脱出来，而从三者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角度，从社会结构的特点来理解历史的进展。这就是我们研究的独特之处”。他后来重申这种方法论的独特之点就在于：“它不片面追求某种变化的终极原因”^②。按他的理解，各种社会关系中，“经济、政治、文化关系是同一层次的”^③。“对系统进行整体研究时，系统内部的关系是相互调节、互为因果的，终极原因是没有意义的”^④。简括地说，金观涛这里所提出的史学方法论的要点是：第一，揭示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的方法，是“片面”的，“无能为力”的，“没有意义”的。这里的“终极原因”，虽然泛指经济、政治、文化的任一方面，实际上只能指的是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决定历史发展的物质的终极原因；第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三者是同一层次的、平列的关系，故我们只能从三者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理解历史的进

① 《贵阳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以下凡引此文，不另注。

② 《历史的沉思》，第36页，三联书店1980年12月版。

③④ 《兴盛与危机》，第279、28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

展。

这是史学方法论的新创造吗？不是。只要不是从孤立、静止的角度去考察对象，而是从事物联系的角度去研究对象，则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便很自然地呈现在人们眼前。这种从相互作用看问题的观点，我们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希腊人那里，“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①。近代思想家康德，也曾多次论述过从相互作用看问题的观点。到了黑格尔那里，对相互作用的研究，就更加充分了。黑格尔认为，事物的根本特性，“就处在本质的相互作用之中”，“事物在相互作用之外便什么也不是”^②。相互作用是事物发展的真正原因。黑格尔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对事物间相互作用的揭示，“假如我们对于某一内容，只依据相互关系的观点去考察，那么事实上这是采取了完全没有概念的态度”，即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问题。因为“相互关系不但不等于概念而且它本身首先必须得到概念的理解”^③。黑格尔指出，应当找出一种决定这种相互作用的更高的“第三者”作为基础，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相互作用，在黑格尔看来，这个“第三者”，“在历史当中，这种原则便是‘精神的特性’——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④。显然，黑格尔没有找对答案。但他不满足于仅仅指出对象的相互作用，而力求找到一种更高的东西作为相互作用的基础，以真正地认识相互作用，却正表明了他的思想的深刻。

马克思恩格斯以黑格尔对相互作用的探讨为起点，扬弃了他的唯心主义答案，而从社会的物质生产领域，找到了历史事物相互作用的真正的谜底。唯物史观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⑤“这样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3页。

② 黑格尔，《逻辑学》下卷，第128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③ 黑格尔，《小逻辑》第321—322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④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04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描述这个过程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①。这也就是恩格斯讲的，

“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②。可见，发现唯物史观，揭示物质生产方式是决定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并不是否认历史因素的相互作用，而是在历史自身的进程中，归根到底从物质生产领域对这种相互作用提供了彻底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解释。

唯物史观提出后，曾不断遭到论敌的攻击。这些论敌的普遍手法之一，便是将相互作用和终极原因对立起来，似乎唯物史观不承认相互作用，只承认经济因素是历史过程的唯一决定因素，从而将唯物史观歪曲成经济决定论。1890年，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保尔·巴爾特的《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一书，以及路·布伦坦诺等，就都是硬把唯物史观歪曲成这样一种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恩格斯痛斥这种歪曲，在晚年的一系列信件中重申：第一，社会历史“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③；第二，政治、文化、思想的发展以经济为基础，但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并对经济也发生影响，“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④；第三，经济发展对意识形态的最终支配作用，并不是说经济自身能够创造任何新的东西，而是它通过政治、法律、道德等为中介，决定着各该领域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第四，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的结果，而是人们自己在一定环境条件制约下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尽管政治、思想等其他各种条件都对这种创造活动产生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具有决定意义；第五，经济运动归根到底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7。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

对历史发展起最终决定作用,是从全部历史发展过程着眼的,并不是要我们对任何一个具体历史问题都要找出经济上的“终极原因”。“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过去和现在的存在,……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①。以上就是恩格斯在反驳巴尔特等人企图用相互作用论来否定唯物史观时,对于从历史因素的相互作用中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物质的终极原因的基本含义。而这种物质终极原因自身,也是在相互作用形式中起到其最终支配作用的。

我在上面之所以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一段围绕相互作用和终极原因关系的思想史实,就是为了从历史经验的启示中,更加简明扼要地看出:九十年后的当代,金观涛又用相互作用论来非难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论,究竟错在哪里。

金观涛认为,研究历史进程,只能从相互作用的角度考察,而探求终极原因则是“片面”的。上述史实告诉我们,在马克思以前,从相互作用的角度考察历史的方法,已经被一些思想家反复探讨过。与仅仅承认相互作用的方法比较,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在承认相互作用的同时,又对其终极原因加以揭示,这究竟是片面的方法,还是更加深刻的历史方法论呢?我想,答案只应是后者。在唯物史观已经向前迈出决定性一步的情况下,金观涛仍否定探讨支配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物质终极原因,主张只限于从相互作用角度考察历史进程,这显然不是进步,而是史学方法论的倒退。

金观涛说,探讨历史进程时,只能从相互作用来考察,而寻求终极原因的方法是“无能为力”的。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实际上,仅仅停留在用相互作用考察问题,才真正是苍白无力,不能令人满足的。黑格尔早就说过:“假如对于某一内容,只依据相互关系的观点去考察,那么事实上这是采取了一个完全没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